

总主编 瓦尔特·吕埃格

General Editor WALTER RÜEGG



欧洲大学史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第一卷 中世纪大学

VOLUME I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主编 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

Edited by H. DE RIDDER-SYMOENS



张斌贤 程玉红 和 震
张 驰 王海芳
等译

王 璞 王 晨 和 震 初校
张斌贤 孙 益 张 驰 审校

河北大学出版社

Hebei University Press

总主编 瓦尔特·吕埃格

General Editor WALTER RÜEGG



欧洲大学史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第一卷 中世纪大学

VOLUME I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主编 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

Edited by H. DE RIDDER-SYMOENS



张斌贤 程玉红 和 震 等译
张 驰 王海芳



冀王 晨和 震 初校
贤孙 益张 驰 审校

河北大学出版社

Hebei University Press



冀图登字：03—2001—013

《欧洲大学史》第一卷《中世纪大学》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ume I,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本书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年版翻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大学史.第1卷,中世纪大学/(瑞士)吕埃格著:

(比)里德-西蒙斯分册主编;张斌贤等译.—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9

ISBN 978-7-81097-194-2

I.欧… II.①吕…②里…③张… III.高等教育—教育
史—欧洲—中世纪 IV.G649.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41867号

责任编辑 臧燕阳 Tel:0312-5921826 E-mail:zyyzmq@yahoo.com.cn

封面设计 王占梅

版式设计 赵谦

责任印制 闻利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规格:1/16(787mm×960mm)

印张:39.5

字数:607千字

印数:1~4500册

版次:2008年8月第1版

印次:2008年8月第1次

书号:ISBN 978-7-81097-194-2/G·582

定价:80.00元



欧洲大学史

总主编兼编委会主席 瓦尔特·吕埃格(瑞士)

编委会

阿萨·布里格斯(英国)

亚历山大·盖伊什托尔(波兰)

诺克特尔·哈默施泰因(德国)

奥拉夫·彼德森(丹麦)

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比利时)

约翰·罗伯茨(英国)

爱德华·希尔斯(美国)

雅克·韦尔热(法国)

编委会秘书

艾利森·德·皮默热-布朗宁(英国)

这套四卷本丛书由欧洲大学校长常设会议(CRE)领导的编委会组织编写。CRE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会员包括东欧和西欧的许多大学,总数超过500个。CRE作为本套丛书的协调者,委托其副秘书长管理全部工作,并任编委会秘书。

在过去的一千年中,大学是欧洲唯一一种基本形式、基本社会作用和功能都保持不变的机构。本套丛书将阐明大学如何且为什么能逐渐包括所有的知识,并遍布于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大学是如何形成欧洲共同智力传统的,以及大学是如何培养学术和职业精英的,这些精英的精神气质具有超越国界的特征。

本套丛书包括:

第一卷 中世纪大学

主编 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

第二卷 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学(1500—1800)

主编 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

第三卷 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大学(1800—1945)

主编 瓦尔特·吕埃格(准备中)*

第四卷 1945年以来的大学

主编 阿萨·布里格斯(准备中)

* 原文如此,第三卷已于200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



译校者序

—

从1982年开始,欧洲大学校长常设会议(the Standing Conference of Rectors, Presidents, and Vice-Chancellors of the European Universities,简称CRE)开始组织欧洲各国和美国有关学科的专家开展一项合作研究,以探讨欧洲大学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基本问题。这项合作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编写了四卷本《欧洲大学史》。《欧洲大学史》第一卷《中世纪大学》于1992年出版,1996年出版了该书第二卷,即《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学(1500—1800)》,第三卷《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大学(1800—1945)》于2004年出版。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套四卷本《欧洲大学史》的第一卷《中世纪大学》。这篇序言的目的是提供一个轮廓,以使读者更好地把握本书的基本结构、内容、特色和价值。^①

^① 关于整套《欧洲大学史》的特色,由于全书并未出齐,且原作者在本书前言部分已经做了非常简明和充分的介绍,故译校者只分别介绍各卷的特点。

在这套《欧洲大学史》出版前后,用英语写作的有关中世纪大学的著作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例如,拉希德的三卷本《欧洲中世纪大学》(1895)^①、桑戴克的《中世纪的大学记录与生活》(1949)^②、鲍德温和古德威特的《政治中的大学——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个案研究》(1972)^③、科班的《中世纪大学及其发展与组织》(1975)^④、莱夫的《13—14世纪的巴黎大学与牛津大学》(1975)^⑤、伊泽温和帕奎的《中世纪后期的大学》(1978)^⑥、班德的《大学与城市》(1988)^⑦、梅鲁的《中世纪欧洲的大学训练》(1993)^⑧、彼德森的《最早的大学——大学馆与欧洲大学教育的起源》(1997)^⑨,等等。那么,与此前出版的有关中世纪大学史著作相比,本书有什么特点呢?

根据我们的初步认识,本书的主要特点和价值有四:

1. 编写的组织方式。如前所述,本书是由欧洲大学校长常设会议组织编写的。这个常设会议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成立于1964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其成员包括欧洲27个国家的470多个高等教育机构。由于常设会议成员的普遍性,因此得以组织起一个庞大的编写队伍,集中各国相关学科的专家共同探讨。本书的作者就包括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波兰、瑞典、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丹麦等11个国家的16位学者。

① Hastings Rashdall.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3 vol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5.

② Lynn Thorndike. *University Record and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9.

③ J. W. Baldwin and R. A. Goldthwaite (eds.), *Universities in Politics: Case Studies from the Late Middle Ages and Early Modern Period*. Baltimore/London, 1972.

④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 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5.

⑤ Gordon Leff. *Paris and Oxford Universities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⑥ Jozef Ijsewijn and Jacques Paquet.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Louvain: Louvain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⑦ Thomas Bender.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From Medieval Origin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⑧ Alfonso Maieru. *University Training in Medieval Europe*. Trans. By D. N. Pryds. Leiden and New York: E. J. Brill, 1993.

⑨ Olaf Pedersen. *The First Universities: Studium Generale and the Origin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其中大多是相关学科领域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学者,如已故的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和社会学教授、《密涅瓦》杂志的创办人爱德华·希尔斯,著名社会史学家、原牛津大学沃斯特学院院长阿萨·布里格斯爵士,以及本书总主编、原法兰克福大学校长瓦尔特·吕埃格等。

与学者个人独立撰写的著作相比,这种编写方式尽管可能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如语言风格的差异、思想的连贯性不足),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也避免了由于学者学术兴趣和视野的局限而带来的著作内容的不平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聚集了一些在中世纪史不同领域(如社会史、经济史、法学史、科学史等)各有专长的知名学者,因而保证了著作本身在整体上的高水平。并且,为避免多人合作所造成的种种问题,《欧洲大学史》的“编委会选择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首先,为每一卷和每一章所涉及的主题都制定了一套内容和方法的指南,并邀请那些愿意合作的人士参加第一轮讨论。在这些讨论中,通过扩展或约定拟承担写作章节的内容,那些未来的作者同意写作的分工。在讨论的过程中,这种合作完成的著作所必需的共识和互相理解得以形成。在第二轮讨论中,各章的初稿被认真审读和详细讨论。来自各国的通信员在主编和作者未被告知的情况下,被邀参加讨论。接着,这些讨论形成的第二稿由主编经过一次或多次会议反复修改,直到通过编委会的程序,各章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模式中”^①。

2. 作者的学科背景。在我国,由于教育史学科最初是作为教师教育的重要科目,因此,包括大学史在内的教育史研究主要是由设有教育专业或学科的师范院校的教学科研人员承担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科研人员很少介入教育史研究(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一些院校历史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开始“涉足”教育史研究)。由于研究人员学科背景的单一性,不可避免地导致教育史研究中就教育而论教育的普遍现象,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对教育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学科背景的多样性。在书中所介绍的16位作者中,有从事古典语言研究的莫妮卡·阿斯塔罗斯,有从事社会史学研究的阿萨·布里格斯,从事教会法史研究的安东尼奥·加西亚·Y·加西亚,从事中世纪史研究

^① 见本书前言。

的亚历山大·盖伊什托尔、戈登·莱夫、彼得·莫拉夫、雷纳·克里斯托夫·施温格、南茜·斯雷斯,从事法律史研究的保罗·纳尔第,从事哲学史和科学史研究的约翰·诺思、奥拉夫·彼德森,从事大学史研究的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雅克·韦尔热,以及从事社会学研究的瓦尔特·吕埃格、爱德华·希尔斯等。

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对于大学史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这是因为,与中小学不同,大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不仅是作为教育机构和文化机构而存在的,它同时也是一种学术机构、社会机构,大学承担着多重社会功能。正因如此,大学历来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密切相关。大学是在与社会的复杂联系中经历变迁、得到发展的。如果仅仅从教育的角度或把大学只当做教育机构,那么就不可能认识和理解大学的历史变迁,也不可能有真正科学的大学史研究。就此而言,如果本书是一部反映西方学术界关于中世纪大学史最新进展的重要著作,那么,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作者多样的学科背景。

3. 本书的内容范围。与同类著作相比,《欧洲大学史》的第一卷《中世纪大学》在内容范围上的特点是非常突出的。迄今为止已经公开出版的关于中世纪大学史的著作,大多是以专题研究或专门研究为主,或者是关于中世纪大学起源的研究(如彼德森的《最早的大学——大学馆与欧洲大学教育的起源》),或者是关于中世纪某一时期的大学研究(如伊泽温和帕奎的《中世纪后期的大学》),或者是关于中世纪大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如班德的《大学与城市》),或者是关于中世纪大学内部某一方面问题的研究(科班的《中世纪大学及其发展与组织》、梅鲁的《中世纪欧洲的大学训练》),或者是关于中世纪大学的个案研究(如莱夫的《13—14世纪的巴黎大学与牛津大学》),如此等等。本书虽然是以专题研究为基础,但就其专题所涉及的范围而言,它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专题研究。在空间上,它涵盖了东欧、中欧、西欧在内的整个欧洲;在时间上,它则跨越了从大学产生之初直到16世纪初的三百多年;在广度上,它包括从大学的管理、财政、建筑,到大学的学科、学院组织、招生、教学、学位授予、考试,直到学生的生活、学习、活动,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同时还广泛地涉及到大学与外部世界(教会、王国、城市)的关系。

就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范围而言,唯一能与之相比拟的是拉希德在一百年前出版的三卷本《欧洲中世纪大学》。尽管拉希德的著作一直被认为是研究中世纪大学的经典之作,但与之相比,本书的特点仍然是非常清晰的。二者之间最为重要的差异在于,拉希德的著作主要侧重在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这三所大学的历史(尽管也涉及到诸多国家的大学)和国别大学史,而本书所要反映的不是(或主要不是)不同大学或不同国家的大学在中世纪的发展,而是欧洲大学的不同侧面,以及由此构成的整体在12—15世纪这三百多年间的变迁。

4. 本书的结构。四卷本《欧洲大学史》是一部关于欧洲大学发展的通史类著作,但它又与一般的编年史不同,是一部“欧洲大学的比较史”,或者说是一部以专题研究为基础的欧洲大学通史。由于是以专题研究为基础,因而确保了整套《欧洲大学史》结构的一致性,也因而保证了全书的整体性。根据主编的介绍,《欧洲大学史》各卷均分为四个部分,各卷的第一部分提供主题的导引和该卷所考察时期大学的分布和发展的综合描述;第二部分共三章,叙述大学的结构,首先是大学与公共当局的关系,然后是大学的内在组织,它的财政、校舍和设备,管理机构及其决策的方式,大学的教师,在第二、三、四卷中,还将有第四章探讨欧洲高等教育机构在其他国家的扩展;第三部分共四章,涉及大学的一个主要使命,即学生在科学和学术知识方面的训练,大学学习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理智的前提,学习科目,学生的日常生活、考试和职业;第四部分的四章,涉及大学的另一个主要职能,即运用批判的方法,证明、更新和扩展人类的知识(第一卷主要涉及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这四个学院或知识领域)。

就历史的编撰而言,很难简单地判断何种结构是好的,而其他的结构是不好的。历史著作结构的不同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取决于作者的历史观念、作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等等。就大学的历史而言,由于大学机构、大学功能,以及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大学发展的特殊性,因此,似乎难以运用编年史的方法和结构,尤其是当研究的对象范围涉及一个广大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以专题研究为基础的历史编撰,可能是较为现实可行的合理方法。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大学发展的基本过程的梳理,从中抽象出

大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并进而形成一个具有逻辑联系的结构,这确实是值得关注的一种历史编撰方式。

我以为,这种编撰方式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有助于通过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大学发展的共同问题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变化,认识和理解大学的不同方面、不同部分,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整体在历史过程中的演变。这样,人们既有可能得到对大学某一个方面或部分的历史变迁的纵向认识,也有可能真正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学历史。由此得到的不再是平面的、静止的和孤立的大学史,而是立体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大学史。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的特点之外,诸如史料之丰富、史料涉及语种之多、叙述分析之细微具体,以及在相关专题的研究中自然地运用比较方法,等等,也都是本书的特色。

二

由于语言、资料、研究力量等方面的原因,国内教育学术界对中世纪大学的研究是非常有限的。近四十多年来,在国内发表的关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专门研究成果仅有 10 余篇论文(其中一篇为译文)。^①但奇怪的是,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在讨论相关问题时,都会非常频繁地涉及到中世纪大学,似乎我们对中世纪大学已经有了非常充分和全面的了解。其实,我们的了解大都局限在:中世纪大学是一个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行会或法人团体;这个团体从教皇、皇帝和国王那里获得了包括内部自治、罢课、免税、免除徭役、自由迁徙等特权;中世纪大学通常由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等组成;按照管理模式的不同,中世纪大学可以分为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学生大学和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大学;中世纪大学已经建立了由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组成的学位制度;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直接起源,等等。而且,在我们有限的知识中,有许多是笼统的、不确定的,有些则完全是以讹传讹。

^① 张斌贤,孙益:“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特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从1984年开始,由于专业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我先后阅读了大量有关中世纪和中世纪大学的书籍和文献;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曾写过有关中世纪大学的论文^①。在翻译和校对本书之前,我自以为对中世纪大学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了解。翻译和校对本书,彻底打破了我原有的“自信”,我真切地感到,与本书所提供的知识和洞见相比,自己已有的关于中世纪大学的知识是多么的匮乏和肤浅。我相信认真阅读本书的读者同样会有类似的感受。我相信,本书对于有兴趣的读者丰富关于中世纪大学的知识,从而深化对大学起源和大学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将发挥特殊的作用。

在关注本书的结构和内容的同时,我认为,读者还应当关心本书编写的动机。关于这一点,本书总主编瓦尔特·吕埃格在前言中的一段话是值得格外注意的:

科学和学术知识共同体重要性的不断增长,加上由于对这种重要性的认识而产生的高等教育机构前所未有的扩张,使欧洲大学不堪重负。尽管在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中央政府管理大学的体制与联邦德国和瑞士的联邦体制,以及与英国大学的法律自治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它们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大学被期望承担的职责各种各样、不断变化、相互矛盾;大学在不断增长的压力下,被要求将各种职责与其传统目的保持一致。

这也就是说,欧洲大学校长常设会议之所以组织编写这套四卷本《欧洲大学史》,是因为在20世纪70、80年代欧洲大学的发展面临着现实的挑战和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大学教育的改革、大学机构的急速扩张,非但未能使大学教育真正满足社会的需要,反倒使大学自身陷入功能冲突的困境。大学的发展向何处去?大学教育当前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如何真正有效地解决大学所面临的问题?

要解答上述问题或难题,“向前看”固然是必须的,但“向后看”也同样重要。正如瓦尔特·吕埃格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0年间改革大学的

^① 张斌贤:“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地位”,《教育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各种努力的失败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对大学的发展和悠久传统的深入认识,是不可能获得解决大学问题的真正有效的方法的”^①。

众所周知,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共同渊源,中世纪大学在其发展过程逐渐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和原则,为现代大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大学源于中世纪法律所具有的法人社团的性质,不仅保证了大学在中世纪异常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为学术自治作为现代大学的基本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依据和法律依据;中世纪大学所建立的学院、宿舍制度,不仅进一步确立了西方传统的学科分类和知识分类,从而为知识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为大学教育的有效进行提供了制度保障;中世纪大学的学位制度不仅在制度上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学位制度提供了范式,甚至其形式也经过改造一直保持至今;其他诸如招生、学生管理、学生与教师的组织、教学过程、教学方式和方法、考试,以及大学在与外界交往和冲突中逐渐形成的行为模式,等等,都对16世纪以后大学的历史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没有中世纪大学,便没有现代大学的迅速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了解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是把握现代大学发展规律的必由之路。没有对中世纪大学历史的深入和全面的认识,是难以真正完整、深刻地理解现代大学的本质的。

由此,我想到在我国正如火如荼开展的一轮又一轮高等教育的改革。根据我的认识,在酝酿高等教育的改革(无论是整个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还是高校内部的改革)时,高等教育界的领导和学者们重点关注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改革的需要和现有体制的问题;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当代的类似做法,而很少冷静地系统回顾大学发展的历史,更不用说中世纪大学的历史。但在实际上,正如其他领域中的改革一样,缺乏历史感,甚至轻视历史,是我们轻易犯错误、不断犯错误和犯很多错误的基本原因之一。由于轻视历史和历史研究,我们为改革支付了我们实际上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并非直接发源于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而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存

^① 见本书前言。

在“先天不足”的缺陷,既缺乏文化传统的滋养,又缺乏社会相关制度的支持。而且,自现代大学教育在中国生根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使中国大学始终未能长时间得到真正稳定的发展。粗略计算一下,一百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相对稳定发展的时间大约在40年左右(即20世纪20年代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多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从大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大学实际上还处于幼年时期,大学的机体依然非常娇嫩,易受外界的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会影响大学自然生长的改革措施(尤其是那些全局性的和根本性的改革),都应该慎之又慎。更何况我们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国际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从事高等教育的改革事业,既无先例可循,又无现成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既需要改革者的勇气和胆识,同样还需要如履薄冰般的小心谨慎。须知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改革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在历史上,并不缺乏这样的事例,即改革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远远大于改革所带来的实际效益。对改革的评价并不取决于改革者的勇气和胆识,也不取决于改革的速率和幅度,而只在于它所造成的整体的和长远的结果。为了避免改革的重大失误,对于明智的改革者来说,对历史的审视无疑是一种最为“经济的”选择。对历史的审视似乎是一种实验,它虽然不会提供现成的改革方案,也不能预测改革的结果,但至少它会告诉人们不要做什么。在人类生活的许多情况下,选择不做什么其实远比选择做什么更需要智慧和胆识。在巍峨的历史大厦面前,人是需要有一种敬畏之心的,否则,我们会因无知而恣意妄为。

本书的翻译和校对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且不说书中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译校者完全不了解的外语词汇,且不说书中运用了大量拉丁语词汇,对译校者更具挑战的是大量欧洲中世纪大学特有的名词、术语。译校者经常面临的困难是,如何既忠实于原文,又能使中文读者不致产生疑惑。举一个最为简单的例子:*studium, studium generale*是书中反复出现的拉丁语词汇。这个词汇在一些中文的论著中有很多译名,例如公共研究所、普通学校、大学校,等等。查阅拉丁语词典可以知道,*studium*的含义是文化教育机构,而*generale*的含义是普遍的、广泛的。在大学兴起以前,这两种机构都已经存在,而它们又与大学的兴起直接相

关(尤其是在意大利)。那么,究竟如何准确地表达这两个词汇的含义,从而既能表达 *studium* 与 *studium generale* 之间的差异,又能表明它们与大学之间的联系?经过多次讨论(包括与翻译爱好者在网上的讨论),我们把这两个词汇分别译成“学馆”、“大学馆”,一方面表明它们的学校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既说明它们与大学的联系,同时又不至于和大学相混淆。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由于面临的巨大困难,翻译和校对工作的进展非常缓慢。初步的翻译工作用了整整两年(2001—2002)时间,从2003年到2004年上半年先后进行了三遍校对,2004年下半年至2005年2月进行了第四遍校对。即使如此,我们仍不能完全确信译文已经达到毫无差错的程度,甚至还可能存在许多问题。只是因为版权的合同期已满,不得已而交付出版。

本书分工如下:张斌贤翻译前言,程玉红翻译第一章、第二章,黄福祥翻译第三章,王海芳翻译第四章、第六章,和震翻译第五章、第十章,张弛翻译第七章、人名索引,杨晓燕翻译第八章、第九章,张斌贤、程玉红翻译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刘冬青翻译主题索引,王璞翻译尾声。和震、王晨、王璞先后负责一、二、三校,张斌贤、孙益、张弛负责第四遍校对。

翻译本书是我多年的愿望。早在1999年4月,当时我还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从事研究工作,因为确定把西方大学史当做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所以花费了大量时间搜集相关资料。在检索资料时发现了当时已经出版的这套书的第一、二卷,欣喜异常,但随后的结果却使我懊丧,在哈佛大学的几个图书馆寻找了几天都未能找到这两本书(因为外借)。情急之下,只好求助当时正在波士顿学院从事研究的周作宇博士。他从该校借到书后,我随即乘坐地铁赶到波士顿学院,在附近的商店复印后再交给他送回图书馆。在返回住处的路上,我一边翻看复印件,一边就下定决心回国后把它译成中文,使更多的人能从中受益。在本书中文版即将出版之际,我要首先感谢周作宇博士的帮助。

我要衷心地感谢我的学生们。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与他们共同度过了虽然艰苦但却乐趣无穷的时光。在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年轻学子的情、勇气和敏锐,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同时我也相信,此次翻译的经历对于他们的学术发展将有重要的影响。

我还要感谢河北大学出版社前社长宫敬才教授。作为一名哲学博士，他对教育的浓厚兴趣使我深受鼓舞，他的远见卓识将使这套四卷本《欧洲大学史》得以陆续与中国读者见面。河北大学出版社臧燕阳编辑为版权的联系，本书的翻译、校对以及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张斌贤

2007年2月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地图一览表^{*}

1. 中世纪大学城	68
2. 1300年前建立的大学	69
3. 1300年尚存的大学	70
4. 1300—1378年建立的大学	71
5. 1378年尚存的大学	72
6. 1378—1500年建立的大学	73
7. 1500年尚存的大学	74

^{*} 地图一览表中的面码为原书页码——译者。